



曹聚仁

中国近百年史话



K250.9/4

2008

仁
著

中国近百年史话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163554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百年史话 / 曹聚仁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11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2811-2

I. 中… II. 曹… III. 中国—近代史—青少年读物
IV. K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0031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朱 锴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3.625

字 数 55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写在前面

《中国近百年史话》是曹聚仁先生（1900—1972）写的一本小册子，拟想读者是历史专业研究者之外的普通大众。

这本《史话》，托始于19世纪中叶，其时正当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开端，收尾至抗战军兴。也可换一种描述，说它纵贯晚清和民国。就本书结构而言，首章“前词”是总论概述性质，接下来的21节则依时间顺序写来，各节大致以人物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所拈出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袁世凯等，重要历史事件则包括甲午海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等。

在五六万字的短小篇幅里，却包容了近百年间的这些重要历史人

万言，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我店近年来首次系统整理、推出“曹聚仁作品系列”，已经刊行和即将刊行的计约三十种。

《中国近百年史话》曾由香港三联书店于2003年出版过繁体字版。此次为大陆第一次刊行其简体字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

2008年10月

前词——十九世纪之中国

写上一个该用百万字来铺叙的大题目，想把它压缩在顶小的篇幅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写起才好。刚巧有一位牧师在谈中国的土布，也就先说这个话题。十七世纪以前，由中国输往欧美的土产，茶叶、瓷器以外，第三样便是土布，（大黄还在其次。）到了十八世纪，蒸汽机，轧棉机，纺织机一登场，情势完全改变了，土布既没有输出的机会，洋布却涌进中国市场来了。那位牧师写道：“火柴从外来，洋油及洋油所带来的各种，代替了中国工业的大部分，对社会有极大的影响。欧洲人读了轮船公司的报告，说棉纱怎样在中国畅销，此种商业，从广东到牛庄，前途极可乐观。但是没有人想到或读到，棉纱在中国畅销的后果，怎样影响到中国产棉地区千万人的生计。这些农民，以前靠着纺织十五寸宽的土布来谋最低限度的生活，一尺

布约须费两天的劳力，（从棉——纱——布的总劳力。）向市场卖出这些布，再买进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余则再买些棉花回来继续纺织。现在呢，外国的棉纱，有了可乐观的前途，中国的土布便完全失掉了它们的市场；这情势到如今越来越紧迫了。手工的纺织工作，既无利可图，又没有别的生产可以代替。（叫他们怎么活下去呢？）”因此，他指出中国民众的心理反应，说：“许多‘文明人’逐渐地进攻中国的内地，中国的无数受祸者，自己不明白受灾害的原因，好像日本农民被地震所造成的，海水或海岸沉落所激起的潮水所淹没一样。其中，也有许多人想到：在外国商业未进来扰乱旧秩序以前，一般的年头是够吃够穿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觉得前途一天一天地黯淡可怕；这样的经验，刺激了他们，使他们由愤激而行动，我们能怪中国人对‘新秩序’表示极度的不满意么？”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欧洲人的角逐，由非洲而亚洲，由近东而远东，到了远东，情势便已不同了。东方人逐渐与西方政治思想接触以后，便产生了民族主义的运动；这一运动，也正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十九世纪前半期弥漫于欧洲各国的政治运动，东方人立刻追随欧洲人之后，成为激进的门徒了！

马克思于太平军向南京进发之际，曾大胆地断定：“中国革

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制度底那装满着炸药的地雷上，并引起早已成熟了的总危机底爆发。”他在百年前，做这样的推断或许还嫌稍早；但到了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带着民族自觉运动的成分，那倒是十分真实的。“洋人”在中国的迈步，恰好碰在民族主义的铁丝网上。前年在上海有过一度如火如荼的胜利游行，行列中夹着色彩鲜艳的秧歌队，头上包着一块红色方巾，一队接着一队，几乎把上海变成了“火焰之海”。一位亲身经历过义和团的老年欧洲人，他对我说：“当年的义和团，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我便和他说：“义和团也是民族求生存的自觉运动！所不同者，那时是‘半自觉’，行动散漫而幼稚！现在是完全觉悟了，这是有组织的行列。”他也点头承认我的说法不错。

一八四八年，在欧洲那是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最富理想意味，最能激起群众反应的时期，却又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出现之年。因此，中国的一切社会运动，除了浓厚的民治色彩，激越的民族自决，必定带上社会主义的色彩。太平天国已经在那儿行“天朝田亩制度”，无政府主义也流行了一时，谭嗣同、康有为在那儿著《大同书》，孙中山也把民族、民权配上民生主义，鼎立而为三。西方的每一波澜，在东方同样地获得

了迅速的反应；十九世纪的中国，才使我们体味到，中国已成为世界性之中国了。

不过，我不妨再引卜吉林（Keplin）的那句诗：“东方自东方，西方自西方。”天下虽说是一家，东方的还是东方的；太平天国挂的是耶稣教的招牌，他们的天国、天父、天兄以及一切论调，还是东方的；曾国藩、李鸿章提倡洋务；他们所着眼的，乃是把西方的坚甲利兵来配我们的孔孟礼教，骨子里更是东方的。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立宪政治，捧出孔孟，和公羊的微言大义来做挡箭牌，托古以改制。孙中山要算带西方的气息最浓重的，结果还是要捧出东方的礼运大同篇来，托孔子来张民生主义的革命胆子。倒是那位坐镇武汉的两湖总督张之洞，一语道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十九世纪，朝野人士所打的斤斗，打来打去，还脱不了这八个大字的圈子。

东方的国家，最西方化的莫如日本，可是一位最东方化的英国人小泉八云，（他在日本讲学，娶日女为妻，在日本成家，归附了日本。）他依然说，日本的工业化，也还是东方的。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对西方文化激烈反应之后，新的日本上场了，新的中国也上场了，到了十九世纪末年，新的印度也已在孕育中中了。

目 录

前词——十九世纪之中国.....	1
一 叛徒.....	1
二 闻头关.....	5
三 诗人之泪.....	9
四 “李鸿章杂烩”	13
五 康有为登场	17
六 新旧士大夫斗法	21
七 西医孙中山	25
八 时代骄子梁启超	29
九 北拳南革	33

一〇 《民报》与章太炎	37
一一 辛亥革命	41
一二 袁世凯	46
一三 革命之梦	51
一四 宋案	57
一五 昙花一现的二次革命	62
一六 前甲寅	66
一七 新华春梦	70
一八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75
一九 “五四”的前夜	80
二〇 五四运动	85
二一 从洋鬼子到洋大人	90
二二 大时代的脉搏	98

一 叛徒

这一本史话，托始于十九世纪中叶，那时正当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相传胡林翼和部下巡视安庆太平军形势，骑在马上，洋洋自得，觉得太平军不堪一击，安庆指日可以收复了。这时候，忽见长江江面，一艘轮船呜呜驶过，他忽而一阵昏迷从马上跌了下来。部属把他救护回营，亲信进候起居，他慨然道：“太平军不足平，不成问题；倒是江面上的轮船，来日大难，不是我们所及料的了。”这是代表湘军（楚军淮军）这些首脑人物的觉悟。这就开始了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

一边是洋务派，主张“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一边是卫道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

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就展开最激烈的斗争。当时，郭嵩焘公使，力主学习欧西物质文明，他从英国回国，一班卫道君子，口诛笔伐，逼得他无路可走，因此不敢进京面圣，溜着躲回湖南去。他亲见曾纪泽坐小轮船奔丧到长沙，长沙官绅大哗，数年不息。他们骂郭嵩焘是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还写了一副对子嘲弄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后来拳变事起，郎中左绍佐曾奏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呢！）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当时也曾成为思想的叛徒。他在小说中描写那时所谓公论：“看看一只大船快沉了，那三人将自己的罗盘及记限仪器等取出呈上，舵工看见，到也和气，那知那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罗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三人垂泪，连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去了！”这正是旧势力压迫新势力的缩写呢！

可是，时势迫人，刚毅、王闿运、叶德辉那一群人心目中

的叛徒，先后辈出，如有星宿下凡，只好付之气数的了。那时，有两个福建人，严复（几道）和林纾（琴南），他们两人，都能做桐城派的古文，（出桐城吴汝纶之门。）而且做得很好。严几道从英国留学回国，（他本来也是学海军的。）便用桐城古文笔法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这三部书，可真是大逆不道。天演论说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道理，说人从猴子进化而来，并不一定是万物之灵。《原富》把孔夫子所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是小人矣”的道理翻了过来，把孜孜为利当作圣人之大道。《群学肄言》，说甲地以为是的，乙地却正以为非；这个国也不见得比那个国好；中国并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地方。（针对着那时的自大狂。）他的老师吴汝纶还替这种学说做保镖，写了序文赞美他们。林琴南，他是不懂洋文的，却翻译多种欧美的小说。那一部使他成名的《茶花女遗事》，就是一部以一个妓女的唯美主义为中心的小说。又如《迦因小传》那个主角，迦因，她还生了一个私生子来收场。新的剑就从旧的剑鞘里跃出；这两个福建人，才真正是叛逆之徒。

福建的南边，那一个滨海的广东省，也产生了两个叛逆之徒：康有为（南海）和孙文（中山）。康南海写了一些怪书，《新

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闹乾坤，在孔庙里翻斤斗。还写了一部《大同书》，通三统，张三世，搬出阴阳怪气的公羊家，扯出变法维新的旗帜。这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的书，装在儒家的外衣里，他们的百日维新，就替三千年的君主政治敲起丧钟来了。孙中山是在君主政治的棺木上敲上钉子的。那时候，大家把他当作红眉毛绿眼睛的反寇看待，写起他的名字来，要把“文”字加上三点，写成“汶”字，才算“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孙氏生于农家，所受名教的影响较轻，不像康南海那样开口“圣人”，闭口“圣人”，要继承道统，才敢毅然举起反叛的火把来。这火把上，有两个大字——“革命”。

“时势造英雄”，这是产生叛逆的世代！

二 闯头关

从谈洋务，讲坚甲利兵，到甲午中日之战，中间过了三十年，从甲午之战到卢沟桥的事变，中间又是三十年，三十年为一世，时代的轮子，一年迅转一年，国际的局势，一年紧迫一年。李鸿章，他说碰上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哪知，后浪逐前浪，我们碰到的变动，比他还大得多。抚今思昔，不觉出了一身冷汗，由现在想到将来，又不自觉出了一身冷汗。

甲午那年（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夏天，一班大名士在北京叫喊着“挾伐倭奴”，翁大先生做群龙之首，把“迎头痛击”的上谕请了出来。不料风势反常，迎头在痛击的，倒反被倭奴击了去。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北京尘沙遮天，失守平壤。鸭绿江的卫汝贤，坐了一顶无顶的轿车，拥到菜市口的街心，下跪在一家干菜铺的门口，演大团圆的喜剧；钢刀一亮，